

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的結構化分析

李 黎 明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摘 要

在過去的二十年以來，理論辯論成為寬廣的國際關係理論領域中日益顯著的部份。如果我們需要使用一組可信而適當的理論，來回答關於在特定條件下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的問題，則現有理論無法提供一個滿意的答案。

本文嘗試提出一個整體的觀點，來理解國際關係中的研究途徑與理論概念現存的分歧情形。基此目的，本研究的目標，在於藉由統攝概念的運用，以建立一個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現象的分析架構，來理解那些理論分歧的現象。

本文的討論並未解決那些現存理論分歧的問題，只是嘗試說明一個理論的爭議將會如何予以解決。

關鍵詞：國際關係、統攝概念、理論辯論、理論分歧、結構化分析、概念結構

* * *

本文為探討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現象的理解與處理方法，亦即，從理論的抽象概念層次，設法獲得分歧概念的整合意義。

本文第一節，在於從整體宏觀的全貌，說明一般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歧不同評價與態度的類別；第二節，在於列舉對理論概念結構持正面觀點且已提出原則性方向或初步概念的若干論點，而這些不同陳述可能需要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整合。第三節，則係運用概念的邏輯意涵與關係，設法去整合前一節的紛雜觀點，實際就是在嘗試整理出一組所謂「指導性原則」，但又不是那麼合於水準的初步原則。第四節，在於就拉格 (John Gerald Ruggie) 與華滋 (Kenneth N. Waltz) 理論爭論的事實，做為一個案例解析，說明運用第三節的結論所得到的分析結果與意涵，來證成所謂「指導性原則」的合理性。

壹、看待理論分歧的三種態度

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成為一門專有領域的學科，源自於 20 世紀 20

年代的發端，而其理論分歧的情形，實則相隨著學科的發展而一直存在。此種理論分歧的情況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否具有某種脈絡？是否存在著跨越分歧的一些觀點？又具有何種探索的意義？本文基於此種疑問，以及欲自進一步對問題的瞭解中，提出一種詮釋的可能方法，以做為在國際關係理論辯論過程中一種註腳的意義。

表 1 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現象三種態度的區分表

	第一種態度	第二種態度	第三種態度
觀點	認同此種理論辯論事實與價值的存在，並相信某一特定的論點，從而為之提出理論的辯護。	相信理論的分歧在於論述的觀點或基礎不同，理論分歧並無矛盾的問題存在，而理論的差異情形可以經由再結構的方式予以整合。	在論述的觀點上超越任一方的論述內容，而在較高的層次提出關於良好理論的鑑識方法，為從方法論的途徑處理理論分歧的問題。
代表性學者	包括了 1. 現實主義「典範內部」的爭議，以及 2. 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以及反思主義等等「典範之間」的爭論。(學者名單略)	1. Edward N. Luttwak 2. Gregory Foster 3. Stanley Hoffmann 4. 石之瑜等。 5. 本文第二節所列舉已經提出具體概念的若干學者。	1.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2. 陳宏銘。
相關文獻	1. Jack Donnelly, 2000, <i>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 . 2. Ole Wæver, 199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1996, "Interests, Power, Knowledg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Robert O. Keohane, ed., 1986, <i>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i> .	1. Gregory D. Foster, 1992,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y." 2. Edward N. Luttwak, 1986, "On the meaning of Strategy." 3. Stanley Hoffmann, 1960,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石之瑜等, 2004 年, 「找魚：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試論」。 5. 本文第二節所列舉的若干文獻。	1.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2002, <i>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i> ; John A. Vasquez,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2. 陳宏銘, 2003 年, 「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以 Vasquez 採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的論戰為焦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製表。

說明：此項分類，乃為作者便於陳述與說明的個人主觀分類。

國際關係不同理論之間的爭議，源自於若干基本假設概念的差異情形。例如，權力平衡、衝突、合作、建制等等概念。誠如考克斯 (Robert W. Cox) 所說，學術慣例總是將現實社會分割為許多相互分離的領域，而後各自擁有自己的理論。^①理論之間的幾次論戰，莫不在這些概念上各持己見，相互抨擊，甚至在既存主要爭論的變數或分析缺點的基礎上，還仍然持續地發展更細部的分歧觀點的討論。^②論戰的持續過程之

註① Robert W. Cox, "Chapter 8,"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04.

註② Evan Braden Montgomery,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2006), pp.151~185; Gerardo Luis Munck, "Gam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Perspectives and Old Concerns,"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2 (January 2001), pp. 173~204.

中，當然各方都獲得了進一步深化與發展的長足進步，或者借鑑對方某些觀點作出適度的修正。然而，在原來的那些基本概念方面，依然是各樹一幟堅持不讓。

就實際情形而論，任何一種被提出的理論或觀點，即使隨即被另一種理論或觀點反駁或取代，但畢竟確已存在著某種特定的具體事象可資證明，吾人實難否認其論述證據的存在。因此，正由於論者的不自知，使得爭論雙方在不同的解釋範圍上，從而處於相互抨擊而固持己見的本位思維之中，阻礙了理論發展的契機。

對國際關係理論產生分歧以及相互間辯論此一事實的認知態度，依據邏輯關係的分類，應可區分為三種情況存在。第一種態度，為認同此種理論辯論事實與價值的存在，並相信某一特定的論點，從而為之提出理論的辯護。第二種態度，為相信理論的分歧在於論述的觀點或基礎不同，理論分歧並無矛盾的問題存在，而理論的差異情形可以經由再結構的方式予以整合。第三種態度，則為在論述的觀點上超越任一方的論述內容，而在較高的層次提出關於良好理論的鑑識方法，為從方法論的途徑處理理論分歧的問題。此三種態度的簡要區分，如表 1。

上述第一種態度，乃為國際關係理論長期發展以來的主流研究態度，學者無不熟諳各家理論的差異內涵，甚至堅持某種理論信仰做為研究的基礎。國際關係學科研究社群中的知名學者，也被清晰的冠以某某學派，固然在持續的辯論中也不斷產生理論的匯合、修改或發展，但依然不能去除理論流派之間基本的區隔界線。觀察國際關係理論爭辯的歷史過程，可以察覺學界慎重的賦予理論爭論有意義的歷史期程分野與辯論次數的界定，說明了對理論分歧情形的主流關注焦點，仍在於堅守各自論述觀點的實際差異內容，包括了所謂現實主義「典範內部」的爭議，以及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甚至反思主義等等「典範之間」的爭論。^③導致此種壁壘分明結果的主要原因，正如董納利（Jack Donnelly）所說，當前研究國際關係學生淺薄與狹隘認知觀點的原因之一，乃為教師授課以「規範性」（*exemplary*）而非「啟發性」（*heuristic*）的指出「推薦閱讀」（*recommended readings*）的方式，使學習者曲解了文獻的原意。以此種對經典原著的理解與據此爭論的認知情形，實則為一般研究者對當前理論爭議的主要態度。董納利認為，我們需要的乃為對研究方法採取更為開放，以及真正能夠追根究底的研究途徑。^④

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現象所持的第三種態度，表現於 1997 年美國國際關係學界對自身學門研究成果評價的爭論。這些論述，刊載於第 91 卷第 4 期美國政治科學論叢

註③ 國際關係理論對話與批判的文獻很多，此處僅提及幾篇代表性的論文。例如，關於現實主義理論典範的內部爭議，主要請參見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關於不同理論典範之間的論戰，主要請參見 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rests, Power, Knowledg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0, No. 2 (Oct. 1996), pp. 177-228;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39 卷 12 期（2000 年 12 月），頁 65-90。

註④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9.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SR)，為 John A. Vasquez 與主流現實主義者雙方，就拉卡托斯 (Imre Lakatos) 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A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MSRPs)^⑤的觀點上，對當前現實主義 (realism) 典範是進步還是退化，展開一系列的辯論。國內學者陳宏銘對此有詳細析論。他指出，能結合這些知識論或方法論的內容以具體評估特定理論之發展，近來在國際關係領域中時有所聞，但並不多見。於 2002 年底，John Vasquez 與 Colin Elman 合編新書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將之前相關學者的文章重新收錄於書中，同時增添若干新文章，名之為「新的論戰」。^⑥

這一場辯論主要關切的是，如何接受或拒絕一個被宣稱為科學的理論？如何評估一個典範的進步或退化？Vasquez 認為，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不是用來檢測一個不易動搖的、被稱之為理論典範共同假設的「硬核」(hard core)，而是以其一組關聯的「理論系列」為評估的目標。正如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就可以視為一組理論系列來評估其是進步還是退化的。Vasquez 認為，現實主義並未能通過拉卡托斯所提出的檢測指標，因此是一個退化的理論典範。^⑦

關於美國學術界的這一場性質特殊的論戰，國內學者也有持完全不同的評價。黃旻華、郭銘傑認為，多數國際關係學者由於缺乏科學哲學的深刻理解，因此他們誤解或誤用拉卡托斯的論點而使得知識上的「真正辯論」未曾發生。「如果 MSRPs 對於科學哲學家的意義不是指導性的而是描述性的，那指導性的原則會由在第一線從事科學活動的科學家自己決定，而 Vasquez 作為一個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家，確實有權選擇將 MSRPs 作為自己從事科學活動的指導性原則，雖然每個科學家如果都這麼做的話其結果可能與 MSRPs 被提出的旨意不符」。「即當所有科學家都自發地以 MSRPs 作為指導科學活動的原則或後設理論時，MSRPs 就失去了認識論多元主義的特質而悖離了原本拉卡托斯提出 MSRPs 的旨意。不過，拉卡托斯也沒有明說科學家不能以 MSRPs 作為從事科學活動的指導性原則」。^⑧

對於上述國內兩種觀點的差異，本文認為陳宏銘對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指導性」運用觀點並無不當。第一，本文並非從科學哲學的角度與意義，來觀察拉卡托斯論點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析的適用與否，反而是希望從理論分歧的內涵

註⑤ John Worrall and Gregory Currie, ed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47-89; 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91-180.

註⑥ 陳宏銘，「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以 Vasquez 採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的論戰為焦點」，*東吳政治學報* (台北)，第 17 期 (2003 年)，頁 53-91。

註⑦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899-91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N.J.: Prentice Hall, 2002) .

註⑧ 黃旻華、郭銘傑，「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國際關係學門的誤用：重新檢視現實主義典範進步或退化的辯論」，*東吳政治學報* (台北)，第 24 期 (2006 年)，頁 117-161。

上，去理解拉卡托斯論點對理論典範發展與整合的啓發性。因此，本文認為，前述1997年的辯論，其重要意義仍然應就國際關係理論內涵的價值而定，而非有無介入黃旻華等所謂在科學哲學領域的真正辯論。其次，黃文指出「Lakatos 也沒有明說科學家不能以 MSRP 作為從事科學活動的指導性原則」，這一句話明顯背離他所強調的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描述性質。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究竟有無指導性的作用與意義，黃文並無作出自己最後的評斷。本文認為，1997年在美國學界的辯論事實，以及「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應用於社會科學議題、社會教育、經濟學等等廣泛領域的情形來看，^⑨其做為「指導性」的價值並不低於其「描述性」的本意。甚且，Vasquez 實際所做的，更說明了對「描述性」意義的深層發展，即為「指導性」意義的工具用途。

然而，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以及 Vasquez 等學者在批判與回應論戰的實際運用，超越了理論自身的爭論，而代表了一種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的第三種態度。但由於其對方法論評估的本意，甚至 Vasquez 對現實主義理論分歧的情況，且作出「退化」的結論，彼等論述僅止於對產生爭議的那些概念進行方法論上的評論，而未予明確提出如何解決這些概念分歧的方法。因此，本文對此次論戰的內容不予涉及，而只是專注於那些分歧概念之間邏輯關係的意義。

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歧情形，持第二種態度的學者，基本上質疑理論論戰的本位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在經歷四次大辯論後，一般的看法，似乎是各自朝著分離的方向肯定了不同學派完成其獨自的成就。然而，也有學者指出，^⑩部份學者是從整合的方向認為各個理論之間逐漸形成了一股融合的趨勢。

自然，持第二種態度的學者，非屬美國國際關係社群的主流觀點。美國有幾位學者，例如魯瓦克 (Edward N. Luttwak)、福斯特 (Gregory Foster)、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 等指出，美國有一種重實用和反概念的觀念，這是由於美國的民族特性與風格所導致。美國人是一種實際問題的解決者，而不是有系統或長程的思想家。重視實用結果，但卻忽略了整個事實的哲學基礎。霍夫曼甚至認為，當我們對統率邊緣的核心理論所知甚少時，卻把精力集中在那些位居邊緣的部份，是一種不成熟的作法。^⑪

註⑨ S. N. Chang (張淑女) and M. H. Chiu (邱美虹), "Using Lakatos's scientific programmes to analyze informal argumentation regarding socioscientific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April 4-7, 2005, Dallas/USA; S. N. Chang,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cience and non-science major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l argument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Lakatos's scientific programmes,"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Aug. 28-Sep.1, 2005, Barcelona/Spain; 桂起權, 「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經濟學應用」, 經濟學家 (北京), 第6期 (1999年), 頁64-69。

註⑩ 宋學文、楊昊, 「整合理論研究之趨勢與應用: 東南亞區域安全的分析」, 政治科學論叢 (台北), 第28期 (2006年6月), 頁39~90; 秦亞青等譯, 「譯者前言」, 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頁14。

註⑪ Edward N. Luttwak, "On the meaning of Strategy," *On the Meaning of Victory: Essays on Strategy*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pp. 263~264; Gregory D. Foster,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y," in James C. Gaston, ed., *Grand Strategy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5~62; Stanley Hoffmann, ed.,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0), pp. 5~7.

因此，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歧情形持第二種態度的人，雖然他們論述的焦點相當分散，也尚未提出具體的整合模式，但是他們自宏觀的角度切入審視現存理論分歧現象的態度，正可以彌補美國學術研究的不足之處。而且已經有多位學者實際上提出了若干具體的概念，他們所呈現的研究期望已然呼之欲出，值得進一步探討，本文將於下一節仔細陳述。

然而，在進入下一節之前，本文必須先行說明一個問題。在國際關係理論辯論中，近期流行一種「理論綜合」(Theoretic Synthesis)的觀點，是從綜合兩種理論的研究途徑，以期獲得對兩種不同現象或理論的綜合解釋，乃為一種理論綜合的觀點，^⑫但此非屬本文所欲分析的性質與範圍。

對於建構主義學者而言，「理論綜合」意味著理論的折衷或相互補充。然而，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種藉由混合各種理論及研究途徑以發現客觀世界真相的觀點。^⑬本文係以後者的觀點，並未將此種混合運用理論的情況列入第二種態度的分類之中。主要是因為，贊同理論綜合的人，主張此類研究應以「問題導向」(problem-driven)而不是「理論導向」(theory-driven)。他們研究的目的集中於綜合解釋經驗事實而非處理理論抽象概念分歧的再結構。亦即，它們並未在更高的層次提出某種跨越分歧的概念。^⑭其次，從 Jeffrey T. Checkel 自理論綜合途徑所得到解釋社會規範的「社會化」三項社會機制觀之，^⑮其所稱「策略計算、角色扮演與規範說服」，顯然更像一種實際行為的描述，而缺乏經由在某些條件假定與簡約的抽象概念所推論得來簡單命題的性質。而後者，才更足以具備作為解釋普遍現象的理論意涵。再者，從建構主義與理性主義綜合的結論來看，如果國際規範的形成可以被視為是「國際規範社群下的策略行動」，^⑯則其實際意義乃為在不拋棄理性主義前提下實際獲得建構主義的目的。此種結果，很難被認為是建構了一個具有抽象概念與結構的完整理論。相對而言，在概念結構化的圖像中，做為一個能夠包容分歧概念與觀點，而居於更上一層的概念，實際上是由於其結構位置所賦予的邏輯與本體上的關係，由此才能夠產生一個具有邏輯意義的理論體系，而非僅僅在觀點或陳述上的妥協或涵蓋。

是以，持第二種態度者的論點果若具有意義，則此種可能存在的知識內涵是什麼？又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結構？它的論述邏輯基礎是怎樣的？又是否具有證成之可能性？此為本文選擇研究的問題。進行此項研究，涉及知識的抽象層次，宜自最基本的概念著手，考察其邏輯關係與本體(ontology)關係，從概念間的諸種關係之中，

註⑫ 關於理論綜合的研究，參見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對話與綜合－美國『防止擴散安全提議』國際規範的個案分析」，*問題與研究*（台北），第45卷第5期（2006年9月），頁17-60。

註⑬ Steve Smith, "Dialogue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Orthodox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2003), p. 143.

註⑭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對話與綜合－美國『防止擴散安全提議』國際規範的個案分析」，頁23。

註⑮ Michael Zurn and Jeffrey T. Checkel, "Getting Socialized to Build Bridges: Constructivism and Rationalism, Europe and the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pp. 1045-1079.

註⑯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對話與綜合－美國『防止擴散安全提議』國際規範的個案分析」，頁29-30。

理解理論爭議與概念分歧的結構性意義。

貳、對理論再結構的若干思考觀點

從文獻中觀察，前述持第二種態度的少數論者，目的在於從理論上融合現存各種不同的分歧觀點，以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架構，乃為自不同的角度思考理論再結構（restructure）的問題，且無公認的共同研究假設。大致而論，這些論點分別從「場」、多元變數、去除模式固見、多元因果關係、框架分析，以及「統攝概念」等不同面向切入，提出理論概念結構化的構想，以嘗試重構理論。

第一，關於「場」（field）觀念的提出。麥可蘭（Charles A. McClelland）於 1959 年討論國際關係理論分類的一篇文章中指稱，有些非常概括性的觀念，例如「均衡」、「場」、「系統」被作為統一國際關係理論方向的指引。而且，它們也需要某些第二層次或不那麼概括性的概念，用來適應國際關係的某些面向。因為，國際關係中的現象包含了重疊與交互的體系，而不可能找到清晰完美的一組分類體系。McClelland 將國際行為做了 A1、A2、A3、B1、B2、B3 等六種分類，A 與 B 代表概念的兩個上下不同層次。A 的層次包括所有關於國際行為體共同的「超文化」（supracultural）的一致屬性，例如國家利益、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外交政策、戰爭等等。相對的，位於下一層 B 的層次中，則為與行為體的個別文化有關而具有個別特性意義的「文化根基」屬性，例如個別行為體的內在情況、氣氛、領導等等。除了可以分為 A 與 B 的兩個層次之外，在同一層次之內，又可區分為「行為者理論」（actor theory）、「互動理論」（interaction theory），以及「環境理論」（environmental theory）等三種分類。例如，不同國家的外交決策即屬於「1」的分類；權力平衡的傳統解釋，即屬於「2」（互動）的分類；第「3」的分類，則指地理、人口、生態、技術、經濟等等國際關係中的環境因素。依此方式，則共有六種類型。麥可蘭認為，卡普蘭（Morton A. Kaplan）的國際體系系統理論即為 A2 的典型分類。^①

就 A 與 B 在層次上的意義而言，麥可蘭在 1966 年，對伯頓（J. W. Burton）的評論中指出，Burton 的論述過於著重國際關係的體系陳述，而忽略對個別行為體特性方面的「次系統」（sub-systems）分析。^②於此觀之，麥可蘭似乎主要是偏重於對某個理論內涵的屬性歸類，其中應該是包括了一組概念的組合，而非針對單一概念的差異而作出概念間的比較分析。同時，他所描述的乃為某個次理論的本質屬性，而非在一個理論體系內各個概念間關係的問題。但是，他至少已具有將 B 層次視為 A 層次的「次

註① Charles A. McClelland, "A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lit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Vol. 2, No. 4 (Mar. 1959), pp. 32-34; Charles A. McClelland, "The Func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 No. 3 (Sep. 1960), pp. 303-336.

註② Charles A. McClelland, "Revi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ener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8, No. 3 (Aug. 1966), pp. 700-702.

系統」的觀念，具有概念間的層次與結構意義，有利於概念得以進一步的分解與衍生。

夏威夷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 Rudolph Joseph Rummel 於 60 年代中期也同樣強調「場理論」(field theories) 的觀點。他指出，經由「場」的理論觀點與概念架構，可以使我們能夠瞭解、描述以及解釋現象。在自然科學以及社會科學領域中，「場」的理論或研究途徑，可以區分為「動力場」(dynamic fields)、「均衡場」(equilibrium fields)，以及「關係場」(relational fields)。動力場必須能夠使「力」、「權力」、「影響力」的能量或潛在能量在空間或區域內連續延伸擴展。均衡場包括了「力」、「要素」、「物體」、「決策」等等之間的平衡。關係場則包括了獨立的各個相互關係與互相從屬的整體。Rummel 進一步指出，在當前心理學與社會學的領域中，場理論面臨兩個令人擔憂的困擾。其一是，在處理場的內部結構關係的推論、理論化、闡明以及結果方面，迄無一個足夠充分的正式分析框架可資運用。其二是，關於場的相關概念與結果，在相關學科中並未充分使用。^⑩ Rummel 也自稱將「場」的觀念引進國際關係領域的理論研究，指出國際關係的結構，係由具體明確以及形式化的不同層次所組成。^⑪ Rummel 除了明確指出概念間有其系統結構，更提示了概念間關係的複雜面向，以及如何推論這些結構關係的困難。這些陳述，有利於概念結構化問題的思考。

Warren R. Phillips 認為 Rummel 場理論的假設，是基於場的特性與國家間彼此相互影響的本質所致。其理論內涵，係將國際間的行為鏈結到國家屬性的異同問題上，以此在社會範圍中陳述國家的互動，此一「場」包括了行為與屬性的兩個空間。易言之，一方面 Rummel 將國家設定在依其特性而區分的屬性空間，例如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另一方面，將國家設定在就雙方行為而言的行為空間，例如貿易模式。國家屬性的相同與相異，即為場的力量，並以此創造社會時空中的行為動機。亦即，國家屬性的差距 (attribute distances)，可以視為一種力量，以此導致國際行為的原因。Phillips 將此歸納為三項形式化的基本原則：第一，國際關係為一個在時間推移中，包含了所有國家屬性、互動，以及複雜關係的「場」；第二，國際關係的領域中，包括了一個由歐氏幾何屬性空間所定義的所有國家的屬性，以及一個由歐氏幾何行為空間所定義的所有國家的互動關係；第三，在某一特定時間的屬性空間內，國家間的屬性差距為決定該時間內雙方地位的社會力量。而所謂國家的屬性，則包括了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地理與政治諸面向。^⑫ Phillips 從 Rummel 的理路進行分析，提出了國家的行為與屬性兩個分析的主要面向，甚且模擬了區分此種複雜關係的立體結構模型，顯現概念結構複雜性的立體圖像。

從「場」的觀點分析國際關係，大致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其一，Rummel 的場的

註⑩ R. J. Rummel, "Field Theories In Summary," *The Dynamic Psychological Field*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75), <http://www.mega.nu/ampp/rummel/dpf.chap6.htm>.

註⑪ R. J. Rumm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r, Power, Peace*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79), Chap. 6.

註⑫ Warren R. Phillips, "Where Have all the Theories Gone?" *World Politics*, Vol. 26, No. 2 (Jan. 1974), pp. 167-172.

觀念基本上是依循社會學的意義與思考，著重角色、地位、溝通以及認知等意義及功能，但是他也提出了行為體之間的結構關係與行為特徵，甚至體系同時存在衝突與合作、均衡的本質，此種概念具有結構的完整組成意涵，而非僅僅從單一的面向觀察體系的實存現象。除了行為者的內在本質屬性以外，它所呈現的外在行為現象，兩者均須列為分析的標的。簡言之，Rummel 的場理論並非狹隘的僅就單一層面進行現象的分析。其二，依據 Phillips 的解讀，場的概念涵蓋了國際行為者所有差異行為的總體結構，國家所依據的觀點與採取的行為模式可能並不相同，但是必然容納於此一「場」的概念結構之內。因此，可以理解，場的觀念所欲揭示的理論架構，本質上乃為一個複雜的立體結構模型。

第二，關於多元變數觀念的提出。這些學者共同的觀點，為主張採用較多的分析變數，然而他們在用詞上並未統一，不同學者分別使用不同的名詞或概念。諸如：factors、variables、branches、parameters 等等，本文將其共通的意義歸納為“multiple variables”。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與李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在國際關係理論上的論點，就具有這樣的意義。他們指出利益、權力與知識三者，為形構與維持國際建制的主要因素（factors or variables）。「以利益為基礎的自由主義、以權力為基礎的現實主義，以及以知識為基礎的認知主義（Cognitivism），這些思想學派對我們瞭解國際建制的貢獻，係基於以檢驗它們如何能夠詳細說明與互補的目的，而非相互之間的競爭，來作出比較與對照」。^②這種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假設，包容於一個架構之內，彼此具有在概念架構中相容與互補之作用，深具理論融合的重要意義。惟 Hasenclever 等的論述範圍，則僅僅侷限在利益、權力與知識這三個概念上，且未予列舉基本概念及其抽象意涵的解釋，尚不足以視為一個概念完整而具有一般性理論意涵的陳述。

Stephen G. Brooks 從理論的分歧現象，提出二元思考，以此論證現實主義內部分歧的融合性。他指出，如果經由對理論假設作出分支（branches）的區劃，例如區分為可能性或或然性、短期或長期目標，以及軍事安全或經濟合作等，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假設，則可以更為清楚的瞭解現實主義內部意見的互補性。例如，國家間可能發生的衝突，是受到可能性或者是政策選擇的制約？一個國家如何衡量其短期與長期目標以做成決策？一個國家如何權衡其軍事安全與經濟能力？在這些問題上，現實主義者顯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分歧觀點。Brooks 認為，以此種分歧觀點的思考為基礎，可以使累積已久而迄今未解的現實主義內部爭議開啓大道。此外，對於現實主義兩種分歧的清晰理解，有助於解釋以往與非現實主義者的互動為何總是令人失望，並且應該使未來雙方更多對話的開創成為可能。^③事實上，此種多元假設的觀點，除了國際關係學

註② Andreas Hasenclever, et.al., “Interests, Power, Knowledg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p. 177-228.

註③ 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pp. 445-477.

科，在其他社會科學廣泛領域均有所見。^④

國際關係學者 Jack S. Levy，則明確提出「多元變數」的觀念。Levy 於比較「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utility theory) 與「設想理論」(prospect theory)^⑤ 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時曾經指出，兩個理論的主要差異之一就是，前者使用太少的變數(parameters) 而作出簡化的分析。同時他也指出國際關係理論典範的爭論，剛好模糊了理論自身具有多元變數的重要意義，除了這兩種理論之間如此，甚至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亦復如是。^⑥ Levy 的觀點，顯然認為現存理論間的爭論正是由於爭論雙方各執一部分假設變數就作出狹隘的推論所導致，而一個有足夠解釋力的理論應該要具有若干相容的多元變數。考克斯也明確指出，結構現實主義的缺陷，主要是在於它所採取的思想形式來自於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與一種特定的社會關係結構，但卻假定它具有普遍的有效性。^⑦ 環境條件假設的狹隘性，自然無法形成多元變數的推論關係。

國內學者石之瑜等認為：「對於人類存在型態的多樣性、發展性、開放性、流動性、混雜性與不可決定性，社會科學家似乎還沒有辦法以寬容的態度來面對」。因而，「社會科學主義者追求對於人類行為的普遍性解釋，會構成一套封閉性的理論系統，為人類社會的生活帶來某種暴力性」。因此，應該「打開原本封閉的解釋系統，指出任何行為選擇均不具備必然性，以及思考做為其他選項的——存在於未來的各種可能發展型態」。亦即「社會科學的目的不只是解釋——被選擇的理由，還要去找尋——以外的可能性」。石之瑜等從「後現代」的觀點，質疑「社會科學家的本領很大，不但具有知識，還有上帝般的權力，可以透過其研究對象範圍的界定來發明人世間的『真理』」。並認為，「如果範圍的劃分可以改變行為法則的內容，是否代表宇宙中跨時空的億萬個變數結構尚未發現？」。易言之，由於時空條件、情境、人的改變，將會發生不一樣的結果，社群範圍裡的大多數行為模式不一定如當下主流學者所稱必然如此不可。而必須考慮在什麼條件下，才能把選擇的空間還給行為者。石之瑜等指出，理論本身不光只是告訴我們一種預測或是解釋的結果，還界定了有哪些「可能性」存在於人類行為之中。換言之，「社會科學家要重新不斷地找尋、建立研究對象，不斷重新劃定範圍，容許這個範圍在歷史上不斷變動」。應該找出「異己以何種型態存在、如何從主流社會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並與其溝通」。^⑧

註④ D. Scott Bennett,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 1816-198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3 (July 1997), pp. 846-878; Robert E. Larzelere and John H. Skeen, "The Method of Multiple Hypotheses: A Neglected Research Strategy in Family Stud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5, No. 4 (1984), pp. 474-492; Bradley A. Thayer, "Correspondence: Start the Evolution without 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Summer 2001), pp. 194-198; J. Scott Armstrong, "Assessing game theory, role playing, and unaided judg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No. 18 (2002), pp. 345-352.

註⑤ 中國大陸有譯為「前景理論」、「期望理論」、「展望理論」等，本文依據石之瑜「設想理論」的譯法。

註⑥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Iss. 1 (Mar. 1997), pp. 87-112.

註⑦ Robert O. Keohane, "Chapter 1,"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p. 18-19.

註⑧ 石之瑜等，「找魚：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試論」，*政治科學論叢*（台北），第20期（2004年6月），頁79-102。

他們共同的想法，乃為將理論分歧的現象歸咎於狹隘的假設與太少的變數，因而提出多面向、多因果關係，以及多種假設條件下的思考，來解決理論間的爭論。然而，他們從理論辯論的主要歧見著手，但卻不一定全屬符合抽象意義的理論基本概念。其次，他們也未能具體說明，如何在概念之間的關係上，來統合這些可能存在的多元的概念？

以上的論點，從表面上而言，雖然只是在批評主流觀點，而意欲強調另一種不同或者反思立場的理論概念，但主要的意義還是在於揭示了具有多元變數的包容性理論概念架構存在的可能性。

第三，關於去除「模式固見」(stereotype) 觀念的提出。美國政治心理學、政治科學以及國際關係學者 Margaret G. Hermann 在 1998 年指出，在國際研究的次領域以及特殊化範圍，存在日增的對話要求，現下發生的許多問題已經突出為世界性的問題。但是因為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我們在國際政治學方面所定義其原動力的觀點，以及我們選用的資訊經常不同，因此我們喜歡與認同我們世界觀的人，而非那些挑戰它的人互動。Hermann 認為，有關國際問題的研究，應該給予更多涉及多種學科的、更多全球範圍的、更多不同本體論的 (ontologically)、認識論的 (epistemologically)、以及更多理論清晰的研究。^⑳ Hermann 也提出了改變國際研究囿於「模式固見」(刻板印象)^㉑的解決方法，諸如：淡化模式固見、強化次分類的可能性、成員間積極的情感聯繫、去本位化 (deprovincialization)，以及基本規範的再結構。其中，「次分類」，即是比原來的分類具有更多差異以及較低層次 (lower-level) 的分類。Hermann 也指出，改變「模式固見」的一般常用方法，乃為提出「次分類」(subtyping) 的討論。此種實踐，則係於原來觀點的字首冠以 neo-的新名詞，例如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等。使這一群組的相關概念具有更寬廣，也同時具有其異質性的特質。^㉒ Hermann 提出的解決方法，除了「次分類」的觀念具有理論的結構化性質，與前述麥可蘭、Rummel 所持看法相同，也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其他多屬研究工作態度的問題。而此「次分類」的觀念，實則即為概念再結構的重要建構方式。

第四，關於多元因果關係 (multiple causes) 的思考。就事物因果關係的看法，Milja Kurki 指出，休謨 (David Hume) 認為我們無從得知因果之間的關係，只能得知某些事物總是會連結在一起，我們並不能看透連結這些事物背後的理性為何，而只能觀察到這些事物的本身。而亞里斯多德將自然界「原因」關係的存在，區分為「物質因」(Material Cause)、「形式因」(Formal Cause)、「目的因」(Final Cause) 與「動力因」(Efficient Cause) 四種形態，從而提供了對原因的寬廣觀點。因此，Kurki 認為，

註 ⑳ Margaret G. Hermann,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1998 ISA Presidential Add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4 (Dec. 1998), pp. 605-606.

註 ㉑ "stereotype" (模式固見)，為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該概念意指：「簡單化的對某一社會大多數成員的行為特徵進行判斷，並盲目地將其普遍使用於該社會的任何一個成員身上」。參見范捷平，「論 Stereotype 的意蘊及在跨文化交際中的功能」，*外語與外語教學* (杭州)，第 10 期 (2003 年)，頁 27-30。

註 ㉒ Margaret G. Hermann,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pp. 612-614.

如果我們視因果分析為多元的、複雜靈敏的、認識論相對主義的，以及方法論開放的，則原先受到休謨式（Humean）束縛而已經加諸於國際關係理論化之上的限制與偏見將會解除。我們可以說，對因果關係的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sed）為基礎，是在世界政治的因果關係理論上，朝向更積極、連貫與務實的途徑開放。³² Kurki 從因果關係的複雜性著手，依據古典哲學觀點陳述因果推論的方向，指出理論概念的多元性與多變數存在的可能，提供了概念結構化的思維基礎。

第五，關於社會運動學家（social movement theorist）提出「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與「統攝概念」（unifying concept）的觀點。社會學家 E. Goffman 首先提出「框架分析」的概念用於社會運動與社會政策的辯論。其後，Snow 與 Benford 發展框架分析（frame-analysis）的觀點，並指出框架為若干概念的集合，而被一個統攝概念（unifying concept）所結合，此一統攝概念用於超越許多複雜的概念，來進行整體的分析。³³ Douglas Creed 等學者認為，這個統攝概念是在使用若干不同概念與分析架構時，用來辨識其潛在的不同假設。³⁴

事實上，「統攝」的概念是一個通俗的名詞，羅森諾（James N. Rosenau）於 1963 年就提及在分析的兩個層次間架構鏈結的觀點。³⁵ 一些文獻在論及南北國家經濟發展議題時，「合作」可以被視為一個統攝的概念。³⁶ 在論及中東問題時，「泛阿主義」（Pan-Arabism）被用作一個統攝的概念。³⁷ 在論及歐盟電力自由化時，「互惠」成為諸會員國間的一個統攝概念。³⁸ 在討論亞洲價值基礎時，對於東南亞多種族的社會而言，也指出需要一個統攝的概念為基礎。³⁹ 在分析國際體系領導地位、媒體以及輿論之間的關係時，如果沒有一個像市場框架或者某些統攝的概念，就很難作出清晰分析。⁴⁰ 然而，這

註³² Milja Kurki, "Causes of a divided discipline: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cau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Issue 2 (April 2006), pp. 189-216.

註³³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Vol. 1 (London: JAI Press, 1988), pp. 197-217.

註³⁴ W. E. Douglas Creed, Jeffrey A. Langstraat, and Maureen A. Scully, "A picture of the frame: Frame analysis as technique and as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 5, Iss. 1 (Jan 2002), p. 37.

註³⁵ Jay S. Goodman, "The Concept of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ackground*, Vol. 8, No. 4 (Feb. 1965), p. 262.

註³⁶ Darcy Ashman, "Strengthening north-south partnership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30, Iss. 1 (March 2001), pp. 74-98.

註³⁷ Michael Seymour, Dan Potts, Eleanor Robson, and Neil Asher Silberman,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Modern Iraq,"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5, Iss. 3 (June 2004), pp. 351-368.

註³⁸ Rainer Eising and Nicolas Jabko, "Moving targe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electricity liber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Iss. 7 (Sep. 2001), pp. 742-767.

註³⁹ Herman Joseph S. Kraft, "Human Rights, ASEAN and Constructivism: Revisiting the 'Asian Values' Discourse," *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Vol. 22, No. 45 (2001), pp. 33-54.

註⁴⁰ Matthew A. Baum and Philip B. K. Pot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Forthcoming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edition, http://www.polisci.ucla.edu/faculty/mbaum/documents/BaumPotter_AnnualRev.pdf.

些文獻僅僅只是提及此一概念，而並未進一步陳述。

比利時學者 Jeroen Van Bouwel 從科學哲學的面向，質疑「結構主義」(Structurism) 能否作為社會科學解釋的新準則。他針對結構主義方法論薄弱之處的再概念化 (Reconceptualisations)、並就「批判現實主義」(critical realism) 與結構主義之間的差異，進行社會科學學科之間的再統一 (reunification)，以建立一個統一的社會科學解釋 (unifying social scientific explanation)。他所要強調的多元解釋主義，乃因為解釋過程是基於所要問的問題。因此，解釋是基於要選擇的層次，而在那些不同層次，則有不同的答案。因之結構主義的以及個體主義者的解釋均可接受而且是必須的。^④為了分析與證明社會科學家所提出的多元變數，必須發展一個解釋的框架，在其中，Bouwel 所強調的即為諸種概念的「統一」。

綜合他們的說法，可以說明：基於不同條件假設，產生了不同的理論觀點。而在這些並列的分歧理論之上，存在著一個「統攝概念」，超越且整合了其次級理論的分歧。

雖然考克斯認為理論分割現象乃為提高理解力的必要方法，但是他也指出，各個分裂的理論仍然繼續維持作為有限的知識主體，抑或轉而作為一種便於研究更大範圍的基礎，乃為一個涉及方法與目標的重大問題。^⑤

上述學者的不同論述，給予理論再結構的意義與目的，提供了可欲的理由。亦即說明了我們為何需要建構一個新的概念分析架構。綜上觀之，本文對於理論再結構的理由，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一、在國際關係或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中的少數學者，他們可能並非主流的觀點，然而認知到理論爭論的主要意義，仍在於從觀點分歧之中尋求可以融合的統一理論的建構意義。

二、少數學者至少提出了理論融合的基本動力，亦即將許多不同的概念融合於一個較寬廣的具有相容性的概念架構之中。然而，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僅只提出了片段或局部的初步架構，尚不足以包容所有曾經產生爭議的那些理論概念。

三、如果某一個被提出的理論，僅僅只能解釋單一的事件，基本上就不應被排除於知識範圍之外，而是應該考慮如何納於一個更具解釋力的概念架構之中。因此，學者提出「場」的觀念，具有建立知識結構的重要意義。

四、「場」的概念，應該係一多元變數的集合，從幾何觀點而論，其結構關係應可區分為縱向的層次關係，以及橫向的面向關係。如何排列與組合這些概念，就是建構完整理論的概念架構，為當前可欲與可行的工作。

五、如欲容納較多的變數以充分解釋國際關係的現象，則勢須將這一組變數經由組織、結構的過程，形成一個具有層次與面向的概念架構，並彰明其相互間的諸種關係。如此，始足以運用原先這些單一的概念，藉由解釋其在架構中的位置（即條件）

註④ Jeroen Van Bouwel, "Questioning structurism as a new standard for social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Graduat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 No. 2 (2004), pp. 204~226.

註⑤ Robert W. Cox, "Chapter 8,"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 204.

的意義，以作出具有合理關係的解釋。易言之，即為建立一組由「統攝概念」所引領之概念架構的觀念。

參、概念結構化的途徑

前述對國際關係理論分歧的不同態度與觀點中，其中第二種態度與觀點，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具有給予進一步探究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在第二節中作出較為詳細的陳述。然而，究竟哪一種說法正確？它們之間的差異有何邏輯上的意義？此即涉及諸種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或結構的問題。

如果必須以建構一個寬廣的概念架構，以理解理論分歧的情況，則對於這些可列舉的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及它的組成邏輯，就必須先予瞭解。易言之，必須先行瞭解如何將這些概念依其意義做出分類，以組成一個知識體系的原則，始足以進一步獲知可能存在的若干指導性準則。對這些問題的瞭解，如下所述，包括了：概念的意義與屬性、概念間的關係及其劃分、範疇的概念與範疇化等等。

概念（concept）的意義，是指被歸為同一類或使用同一名詞命名之對象（objects）或事件（events）的共同屬性。概念和概念之間有時相屬，有時是分割的，藉由分類與連結的方式，可將彼此之間的關連性呈現。^④

概念的屬性，區分為「質」與「量」的兩個方面，也稱之為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其中，內涵是就質而言，是概念對事物的本質的反映，反映在概念中的思維對象的特有屬性或本質屬性。外延是就量而言，是概念對事物範圍的反映，係指概念的適用對象，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屬性或本質屬性的對象，為概念所指稱或表達的對象。內涵和外延這兩個性質，在分析一判斷和推論的正確價質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⑤

概念間的關係，可以分為邏輯關係與本體（ontology）關係。邏輯關係指的是同一、屬種、交叉、全異以及否定關係。本體關係，則為空間上的整體與部分關係、時間上的連續關係。邏輯關係與本體關係，合而構成「概念系統」。在概念系統中，各概念間可發生縱向或橫向關係，概念間也存在著因果、工具以及繼承關係等。^⑥從外延方面來看，概念之間具有相容與不相容兩類關係。外延關係包括著相容關係與不相容關係。相容關係，是指概念在外延上至少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包括交叉關係、種屬關係、屬種關係、全同關係；不相容關係，又稱全異關係，意指概念之間在外延上沒有一個重合，包括矛盾關係（如「紅」與「非紅」）、對立關係（如「紅」與「藍」）。^⑦

註④ 余民寧，有意義的學習概念構圖之研究（台北：商鼎文化，1997年），頁70。

註⑤ 李哲賢，「荀子名學研究在美國」，<http://140.125.168.74/china/teachers/newleeweb/writing/%E8%8D%80%E5%AD%90%E5%90%8D%E5%AD%B8%E7%A0%94%E7%A9%B6%E5%9C%A8%E7%BE%8E%E5%9C%8B.doc>。

註⑥ 阮明淑、溫達茂，「ontology 應用於知識組織之初探」，佛教圖書館館訊（台北），第32期（2002年），頁7-8。

註⑦ 李哲賢，「荀子名學研究在美國」；陳偉評，「刑法學兩個競合的邏輯學論證」，2007年6月21日，http://big5.chinalawinfo.com:8080/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8547。

以上所述，乃為就概念與概念之間的可能關係，提出某些依據的原則，但尚不足以做為建構一組概念架構的指導。如欲建構一組概念體系，最好從「範疇」與「範疇化」的觀點予以瞭解。

顯然，依據上述意義的一個概念結構體系中，某一部份概念的組合，就其自身而言，必然具有某種意義的內在相關性，能夠自成一個特定的組合部份。在某種意義上，此種分組歸納的結果，亦稱為類型。類型的各個成分是用假設的各個特別屬性來識別的，這些屬性彼此之間互不全同而集合起來卻又包羅無遺。此種分組歸類的方法，因在各種現象之間建立相關的關係而有助於因果關係的探索與論證。此一特定的組合部份，即為「範疇」(categories)的意義。範疇與概念不同，範疇指涉分組的歸屬。因為當前述概念構圖完成以後，某一部分與其他部份在結構的意義上具有某種意義，這一部分或另一部分，即稱之為某一特定的範疇，可以用來瞭解部份與部份之間的關係。「範疇化」則是對混淆的連續體賦予一個秩序，即在某一模式或方法之下，將資訊或知識的連續體劃分為許多類與範疇，同一的「類」與「範疇」，具有共同的性質與屬性。範疇化是藉共有屬性給予分類的，亦即具有相同屬性的歸於同一範疇。在知覺對象方面，則以類同的功能、用法、或相似的外表為基礎進行範疇化。^④因此，從範疇化的目的來說，即是建立一組相關概念的結構體系。而在圖 1 中，概念 X 以下包含的所有縱向層次以及橫向並列概念，或者概念 B 以下包含的所有縱向層次以及橫向並列概念，均可視為一個特定的「範疇」，概念 B2 以下亦同。

範疇化是我們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重要方法。Eleanor Rosch 在其“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一文中指出，他於 1976 年提出的“two axes of categorization”，乃為具有一種縱向與橫向結構關係的範疇系統。縱向的層次為包含、支配關係的層次，橫向的層次則為分割、對比關係的層次。而我們能夠顯而易見的某些概念，為具有基本顯著特徵的事物，乃構成了基本層次的範疇 (basic-level category)。在基本層次範疇的上層，有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高層次範疇。在下則有較具體、較少概括性的低層次範疇。此三個層次，構成了概念結構中的等級結構，使我們能夠認識、解讀世界。^⑤

依據上述的意義，進行對概念的界定與劃分，則概念間的關係所呈現的體系結構或模型，可以視為一個具有層級與非層級關係的概念架構。亦即層級關係具有屬種與整體與部分關係，而同一層級間則為並列關係。此種對概念的分類方法，即建立於概念邏輯的基礎之上，利用概念的劃分或概括，產生概念的從屬關係和並列關係。^⑥

概念的分類乃基於上述概念間的關係而進行，新概念可從認知結構中原有的具有較高概括性的一個屬概念中衍生分成若干個種概念，來揭示概念外延的邏輯方法，並使概念知識系統化。此項分類係依據所分析對象的一定屬性作為標準，將一個屬概念的外延分成若干種概念，或者是把一個具體的對象肢解成許多構成部分，以明確其外

註④ 洪成完，「概念、範疇與遵循規則」，東吳哲學學報（台北），第 5 期（2000 年），頁 85-147。

註⑤ Eleanor Rosch,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Allan Collins and Edward E. Smith, eds., *Rea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 a Perspective from Psych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1988), pp. 312-322.

註⑥ 阮明淑、溫達茂，「ontology 應用於知識組織之初探」，頁 8。

延的邏輯方法。簡言之，此種劃分，是由母項、子項和依據三個部分所構成。此外，依據劃分的層次可以分為一次劃分（一層）和連續劃分（多層），依據劃分的子項的數目不同，可以分為二分法劃分和多分法劃分。^⑤在國際關係學科之內，多元變數之本質，使得此種劃分必然呈現多層次、多分法的結構圖形。在圖 1 中的虛線，即表示多種概念存在的可能性，且非吾人所能確定。圖示的結構，僅能視為一種基本形式。

例如，在圖 1 中，隸屬於某個概念 X 所衍生的一組概念中，概念 A、B、C 分別對概念 X 而言，具有縱向層級的上下或先後關係。B1、B2、B3，分別對概念 B 而言，亦具有縱向層級的上下或先後關係。B21、B22、B23，相對於 B2 亦同。其次，概念 A、B、C 之間、B1、B2、B3 之間、B21、B22、B23 之間，則均為同一層級間的並列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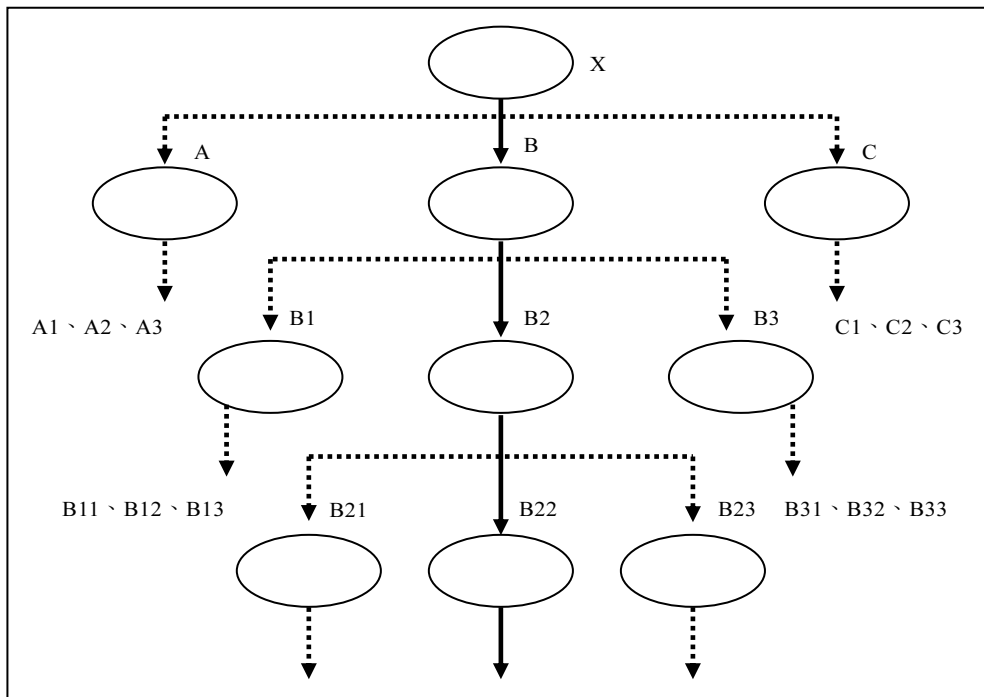


圖 1 概念結構體系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明：圖內每一個橢圓形，均代表一項概念。例如「體系」、「單元」、「衝突」或「合作」等等。

經由前述方式所建構的概念構圖（Concept Maps），有如雙向度階層結構圖、^⑥蛛

註⑤ 李哲賢，「荀子名學研究在美國」。

註⑥ J. D. Novak, "Concept maps and Vee diagrams: Two metacognitive tools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Science*, No. 19 (1990), pp. 29~52.

網圖、鎖鍊圖以及階層圖，分別說明概念間的從屬、階層或因果關係。^{⑤②}也有將之區分為：「連結相關概念的概念圖」、「呈現因果關係的概念圖」、「評估想法的概念圖」。「連結相關概念的概念圖」包含了「蛛網圖」和「階層圖」；「呈現因果關係的概念圖」則是指「鎖鍊圖」和「魚骨圖」；「評估想法的概念圖」包含了「權衡圖」和「環扣圖」。

^{⑤③}此外，也有人提出 Vee 圖，或稱 V 字圖 (V Mapping)，用以做概念的分析。^{⑤④}

在繪製概念構圖時，需能清楚定義主要的概念，並將不同概念從普遍到特殊加以分類，再將這些概念做有意義的聯結。繪製概念圖時需注意縱向與橫向兩個維度：概念在縱向維度呈現的是階層性，較一般化的、包含較廣的概念放在較高的層次。較專一的、包含較少的概念放在較低的層次；在橫向維度方面，則呈現不同概念間的相互間關係。^{⑤⑤}關於概念的階層性關係，可以用前述 Snow 與 Benford 等框架分析與統攝概念的觀點予以理解，則更為清晰。

另外，概念結構所呈現的範疇，並非那麼精確。操鳳玲指出，範疇是對客觀事物本質屬性的概括反應，因此，同一範疇內的各個組成成員必須具有相近的本質屬性，但這並不意味著各成員屬性完全一樣。除了家族屬性之外，各成員又有獨特的屬性。因此，就某一範疇的總體而言，它的屬性不可能十分精確，而存在著相當的模糊性。^{⑤⑥}

依據上述概念與範疇的觀念與形構方法，對於如何建構一組分歧理論的概念間架構，本文提出如下幾點初探性的「指導性」原則：^{⑤⑦}

- 一、將不同理論間的若干複雜概念作出層次與面向意義上的安排，形成一組結構化的關係，從而有利於辨識其相互關係，以此有助於獲得個別概念在整體中意義的理解。
- 二、任一組概念體系，都是可以人為整合與建構的，但是必須依據論述的範圍，以及概念間的邏輯關係而為之。
- 三、概念構圖顯示概念間的多種關係，因而具有多種形式的存在，其構圖形式端視主觀的目的與需要，以及體系建構的選擇與策略。
- 四、概念結構體系，係由處於縱向從屬的不同層次，以及橫向並列的不同面向，兩個維度所構成。國際關係研究的範圍與問題性質，多數為探討其因果關係的論題。以此而論，國際關係理論的概念結構體系中，其不同層次間的從屬

註^{⑤②} B. F. Jones, A. S. Palinscar, D. S. Ogle, and E. G. Carr, eds., *Strateg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gnitive instruction in the content areas*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987) .

註^{⑤③} P. Tarquin and S. Walker, *Creating success in the classroom* (Englewood, CO: Teacher Ideas Press, 1997) .

註^{⑤④} D. Bob Gowin, *Educat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Kenneth Ewart Boulding and Lawrence Senesh, *The Optimum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Making Knowledge Serve Human Betterment*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83) , p. 112.

註^{⑤⑤} J. H. Wandersee, "Concept mapping and the cartography of cogni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 27, No. 10 (1990) , pp. 923-936.

註^{⑤⑥} 操鳳玲，「模糊語言的語用基礎－範疇的模糊性」，*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安徽安慶），第 21 卷第 6 期（2002 年），頁 97-99。

註^{⑤⑦} 本文為文的目的以及有限能力的限制，使得本文僅限於在提出一種思考的途徑，而不在於涉越任何理論與方法論建構的界線。

關係，可以因果關係聯繫之。而不同面向的並列關係，可以不同的條件假設區分之。

五、「統攝概念」，乃為理解概念結構化的主要關鍵概念。由於結構的多層次性，對於次級層次而言，若干統攝概念又形成並列的同級概念，其上一層次將存在相對此一層次的另一統攝概念。理論的概念體系，即是由此種多層次的統攝概念所組合而成。

肆、理論歧見在概念場內的相容性

國際關係理論間的爭論，不但是多層次的，也是多面向的，其所爭論的主題及概念，分處於相當複雜的知識結構之中。如果全部予以納入討論，則是一項遠比本文複雜的工作，而且，也並非本文能力所及。因此，本文僅僅選擇一項代表性的爭論，作為一個個案研究的方式，進行其分歧的概念或理論陳述在概念場中的相容性分析，以說明概念結構化在理論爭論中的意義。

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國際關係理論論戰中，基歐漢 (Robert O. Keohane) 認為，只有被視為建構主義先驅的拉格 1983 年的那篇文章，才真正稱得上是對華滋的評論。^{⑤⑧}拉格針對華滋 1979 年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的巨著，在 *World Politics* 期刊發表評論，對新現實主義提出重要的批判。^{⑤⑨}拉格的批判，主要是針對華滋排除了國際組成單元的功能對國際體系影響的因素，而只認為「國際結構只是隨著組織原則的改變而改變，如果組織原則未變化，國際結構則僅隨著單元實力的改變而改變」的觀點。^{⑥⑩}華滋隨後也作出回應，主要的爭論大致可歸納為三點。

首先，拉格指出華滋所稱政治結構包括三個分析部份：體系的排序或組織的原則；單元的差異及其功能的特性；體系內能力的集中或分散的程度。對於華滋認為「國家並不存在除了相對能力所導致的功能差異之外的其他功能差異，國際層面並不需要政治結構的第二個組成部份」的觀點，以及華滋對這個部份的排除，拉格認為並不恰當。因為，拉格認為國家的功能差異在面對國內權威性的行動若有其效用，則它在對應的國際層面上應該變得更為重要。^{⑥⑪}拉格以中世紀封建國家與當代民族國家在此一因素上的差異，所呈現對國際體系轉變的意義，批評華滋沒有據此提供一種解釋國際環境變遷的方法。^{⑥⑫}華滋對於此項批判的回應，仍然堅稱，拉格所說的因素不會促使國際社會因為單元的相似性而鬆散聯繫的狀態，轉變為不相似的單元因其差異性而緊

註⑤⑧ Robert O. Keohane, "Chapter 1,"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 16.

註⑤⑨ John Gerard Ruggie, "Review: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Jan. 1983), pp. 261~285; John Gerard Ruggie, "Chapter 6,"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p. 131~157.

註⑥⑩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93.

註⑥⑪ John Gerard Ruggie, "Chapter 6,"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 147.

註⑥⑫ John Gerard Ruggie, "Chapter 6,"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 141.

密關聯的另一種狀態。^③

從第一項歧見的爭論，可以看出兩者的爭論顯然不是同一個問題。華滋的論點僅僅關切因為國家能力所導致體系的權力改變關係，為談論一種基於能力來解釋的體系結構中的權力關係，而不涉及任何其他因素。拉格所談論的，卻是由於國家功能差異所導致體系特徵改變的問題，是在談論一個影響「體系特徵」的因素，而非華滋要談的「權力」或「能力」。「權力」、「能力」或者「體系特徵」，顯然是「量」與「質」的區別，亦即為概念的「外延」或「內涵」的區分，是分屬兩個不同面向的並列關係的概念。因此，兩者係陳述不同條件下的概念與問題，只有分辨其假設條件的差異問題，而無比較孰是孰非的意義。另一方面，華滋已經先天設定了他所要解釋的體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條件下的體系特徵。而拉格所指，卻是中世紀神權「等級結構」下的體系與「無政府狀態」下體系轉變的問題，兩者對於國際體系的先決假設條件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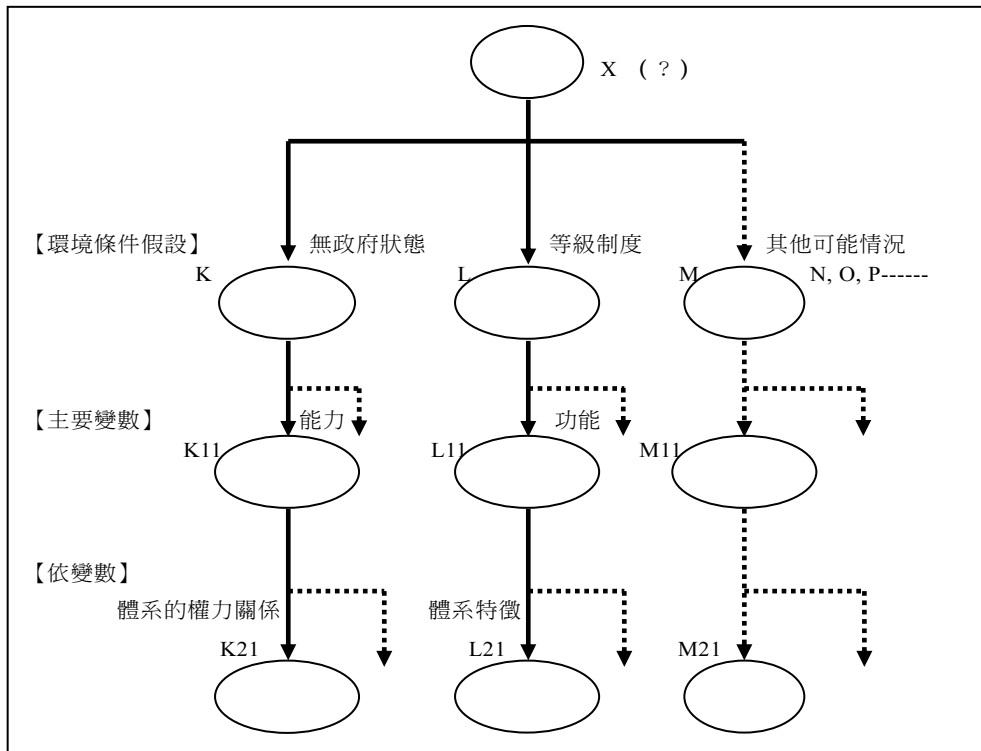


圖 2 假設條件差異結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因此，如圖 2 所示，華滋的理論，僅僅設限在 K、K11、K21 的範疇之內，而無涉

註 ③ Kenneth N. Waltz, "Chapter 11,"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 326.

L, 以及 M、N、O、P (其他可能) ④等等範疇。雖然拉格所質疑的問題, 為國際體系環境改變的問題, 但拉格的理論前提假設, 卻屬於 L、L11、L21 等範疇, 為另一種國際狀態, 並不同於華滋的「無政府狀態」。因此, 不能以華滋依據單元實力改變的理論來解釋拉格所提國際體系環境改變的問題。

上述將華滋與拉格的論點定位在 K、K11、K21 與 L、L11、L21, 僅僅為一種假設關係位置, 也許會是 N、N11、N21 與 P、P11、P21 的位置。然而, 均可能有某個 (X) 能夠包容它們。亦即, 兩者各有其解釋的問題與適用範圍, 且均涵蓋於某個 (X) 之下, 屬於更高層次的另一種國際關係理論。亦即它們有可能被包容於 (X) 的「統攝概念」之內, 成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

顯然, 此種更高層次的理論, 為僅僅在本文所假定的結構下的產物, 而尚未被提出。在現存世界也許並無一個真正能夠包容華滋與拉格且存在於 (X) 之下的情況。

然而果真能有一個可以包容「無政府狀態」以及「等級制度」兩種「環境條件假設」的新假設, 則必然可以使拉格與華滋的不同觀點同時存在於一個新理論之內而不相衝突。依此類推, 圖中所有虛線的部份, 均有形成新的假設條件的可能性。

易言之, 上述兩者的論述係站在橫向並列的層次上, 分別主張單元的「能力」或單元的「功能」才具有影響國際體系的效果。由於兩者均能提出相當的論證, 亦即, 此兩個概念應均具有解釋國際體系改變的意義。顯然兩者各自堅持其論點所作出的解釋, 為僅僅在符合其環境條件情況下的結果, 或者說是在符合各自所稱體系改變定義下的情況。

其次, 依據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的觀點, 當社會互動頻繁, 動態密度 (dynamic density) 升高, 致足以引發機械連帶社會轉變成有機連帶社會時, 就會導致社會本質的重大改變。拉格批評華滋引用涂爾幹的此項觀點, 但卻沒有視其「動態密度」為國際體系變化的可能來源, 主要原因為華滋的理論採取了描述性而非因果性的做法, 因此拉格認為他的推論是不當的。⑤華滋則辯稱, 問題不在於他自己忽略了什麼, 而在於我們應該從什麼層次上可以觀察到這些作用。例如, 核子武器改變的是, 國際體系上層結構變得更為和平, 然而, 每一個國家還是要盡其所能的為自身謀利益。核武國家在軍事上的持續競爭, 存在於結構中的體系連續性, 說明了後者。核子武器掌握在某些國家之中, 則有助於說明前者。⑥華滋更進一步說明了, 就因為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的體系, 國家之間係依據他們的強大程度排列地位, 國家行為因權力的差別而出現差異, 其程度要超過意識形態、財產關係等等差別所造成的差異, 這就是為何僅僅將國家間能力的分配才納入結構的定義之中。⑦

在第二點爭論中, 華滋所稱觀察層次不同的問題, 其實係指稱其理論首要觀察的主要變數並非體系單元的「功能」, 而是單元的「能力」變數。亦即, 指出了主要與次要影響因素的不同效果與意義。他認為單元的變化固然影響了體系的外觀, 但是卻沒有影響單元在體系中的自利行為本質, 強調了體系才是關鍵影響因素。反之, 拉格則

註④ 所謂「其他可能」等等範疇, 即石之瑜所稱, 尚有待發現的任何可能性。

註⑤ John Gerard Ruggie, "Chapter 6,"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p. 148~150.

註⑥ Kenneth N. Waltz, "Chapter 11,"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p. 327~328.

註⑦ Kenneth N. Waltz, "Chapter 11,"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 329.

持相反的看法。這就說明了兩者為不同的理論內涵，但是卻有可能容納於 X (?) 的「統攝概念」之內，而具有更寬廣的另一種理論假設。

第三，拉格認為，由於華滋主張理論應該簡約化，才因而排除了其他有關的影響因素。簡言之，拉格認為，在任何社會體系中，結構變化最終的來源不外乎是單元層次的過程，然而，華滋卻將這些過程從體系理論中排除，因此無法解釋體系變遷的邏輯。^⑧華滋的回應指出，「結構從不會告訴我們想知道的所有事情，反之，結構只告訴我們若干大而重要的事情。——集中於持續時間較長的那些體系要素與力量」。易言之，體系理論必須具有結構概念的抽象水準。^⑨

關於第三點爭論，相當明確的說明了兩者係分別站在「體系」與「單元」兩個不同的面向，論述體系變化的原因。其論述的對象不同，自然產生分歧的結論。若欲更精緻的將此種差異納入同一個理論體系之中，則可以在圖 2 中，插入一個包含「體系」與「單元」等概念的「分析對象」的層次，置於「環境條件假設」(即 K) 與「主要變數」(即 K1) 兩個層次之間，謂之 K0 的層次，如圖 3。在圖 3 內，我們可以說，在「環境條件假設」K (或 L、M-----) 之下，對於 K1 層「主要變數」的分析 (包括 K11、K12、---K1n)，仍然可以再區分為「體系」與「單元」等兩種以上的不同「分析對象」，分別做為一組獨立的「統攝概念」，如 K01、K02---K0n。在圖 3 中，華滋的理論屬於 K-K01-K11-K21 的範疇，而 K02、K0n、K12、K1n 等等，則均屬尚未被提出的理論觀點。

至於拉格對「單元」的主張，因為其「環境條件假設」並不同於華滋的「無政府狀態」，而係「等級制度」。因此，將圖 3 內的「環境條件假設」K，改為 L 之後，其內的 L-L02-L11-L21 範疇，即為拉格的理論。

經由邏輯關係所建構的知識結構概念圖，至此已經可以包容拉格與華滋所爭論的不同觀點。在圖中，吾人亦發現許多由於邏輯關係可能產生而尚未被提出的範疇 (虛線部份)，此正是一個完整理論的可能發展空間。

上述的推論與解釋，究竟有無說服力，吾人可以觀察華特 (Stephen Walt) 與華滋關於同一個現象的不同說詞來判斷。在國家結盟行為中，華特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來解釋這些異常的結盟行為，即平衡乃導因於「威脅」(threat) 而非權力。David C. Kang 也以東亞的實例做為此一論點的個案驗證，說明東亞國家沒有對中共採取抗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並未感受到中共的威脅。^⑩華特指出他的「威脅平衡」理論 (theory of balance of threat) 優於華滋的「權力平衡」理論。但是，華特認為這是現實主義的知識成長 (incrementalist)，應該視為傳統權力平衡理論的一項精煉 (refinement)，補充和完善了均勢理論，是現實主義者的成員。^⑪華滋卻認為，華特並沒有提出新理論，

註⑧ John Gerard Ruggie, "Chapter 6,"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p. 151~152.

註⑨ Kenneth N. Waltz, "Chapter 11,"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p. 329~330.

註⑩ David C. Kang,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3 (April 2003), pp. 165~180.

註⑪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63; Stephen Walt,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p. 931~935.

只是將他的理論運用於研究對外決策而已。^②在兩者的說詞上，如果能夠同意平衡的可能行為模式，在某一「統攝概念」之下，至少存在兩種以上的可能原因，則其實並無理論上的矛盾。換言之，圖中任何一個概念，對於其所屬的下層諸概念而言，均成爲一個「統攝概念」，此即爲概念結構化的主要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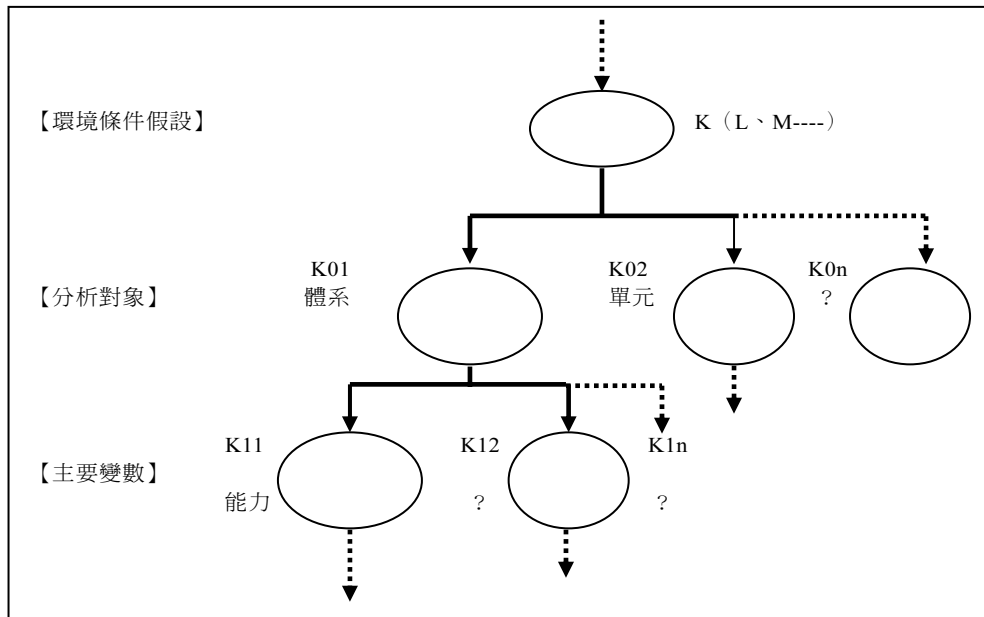


圖 3 分析對象差異結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拉卡托斯於其《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指出，「輔助假設」(auxiliary hypotheses) 構成的保護帶 (protective belt)，是在保護理論的核心。理論面臨考驗時，輔助假設所構成的保護帶首當其衝受到檢驗，必須進行調整再調整，甚或全部轉換，以保衛理論核心。如果輔助假設所形成的保護帶，導致一個進步的問題的轉換，這個研究綱領就是成功的。其次，積極性的誘導，係由一組或明或暗的提示、暗示所組成，用以發展該研究綱領內「可反駁的」各種變數，經由修改、精鍊該可反駁的保護帶，指導著綱領內特定理論的產生。^③拉卡托斯所稱「輔助假設」的補充與積極調整，可能需要在並列關係中尋求對某一概念的「全異」或「對立」等等概念的包容，以彌補原來假設條件的侷限與不足。此一任務唯有以更高層次的某個「統攝概念」來擔任。

Thomas Stanley Mowle 認爲，國家外交政策究竟採取自由主義抑或現實主義觀點，主要是基於外部環境條件的影響。^④基歐漢亦指出，「如果我們要求一種面對特定

註^② Kenneth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p. 916.

註^③ John Worrall and Gregory Currie, ed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pp. 47~51.

註^④ Thomas Stanley Mowle, "When do states adopt realist or liberal foreign policies toward ongoing wars?" An analysis using worldview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6, <http://handle.dtic.mil/100.2/ADA311580>.

條件下的國家行為各種問題的充分理論，就必須提出一套合理又可接受檢驗的答案」。^⑤中國大陸學者陳寒溪認為，經過幾次理論上進步的問題轉換，華滋的綱領不僅包括了系統層次的理論，也包括了單元層次的理論，從而推動了均勢理論的發展。^⑥這些陳述，雖然不是那麼清晰與具體，但是不難看出，他們已然指出存在一個具有統攝能力的概念，可以來包容這些理論分歧的現象。

綜觀拉格與華滋的爭論，由於論述觀點與界定之不同，即無評價的共同基準，自然不能作出相互比較的結果。因此，「體系」與「單元」，以及其他產生分歧的許多概念，均可以「統攝概念」的模式，列入理論概念架構之中，使其能夠成爲一個可以描述多種現象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惟必須界定其條件情況、分析對象等等概念之間的某種相關關係。

不論結構化構想的實際能力與效果如何渺小，圖 3 被建構出來的目的，以及其基於邏輯可能關係所建構的，以「統攝概念」爲核心的多元、多層次結構體系，即是嘗試能夠體現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以及基歐漢、Mowle 等人所稱在特定條件下滿足充分理論的實用途徑。

伍、結 論

本文分析所引用的文獻，無法窮盡與週延，可能流於主觀選擇或斷章取義之虞，然而，就分析核心焦點的第二種論點特殊性意義而言，對於一種簡單的結構化概念已足夠獲致啓發的作用。甚且他們所提出的若干觀點，例如多元變數與多因果關係，其主要意義其實是重複的。綜合以上的陳述，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本文在第一節曾提出理論分歧的情況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否具有某種脈絡？是否存在著跨越分歧的一些觀點？又具有何種探索的意義？經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理解到，在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的洪流之外，確實有一種跨越分歧、微弱、但卻具有意義的期待整合的聲音。理論爭議與概念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因爲論述假設的不同。由於初始條件的侷限，導致理論向各自限定的方向發展，並以多種不同面貌呈現，自然難以遂行全面與週延的解釋。不若自然科學在論述前提上明確設定初始條件的嚴謹形式，國際關係理論的陳述往往從直覺的觀念出發，經由主觀選取的證據進行論證的工作，因而在新的事實下產生理論解釋不足的情形。概念結構化的思考途徑，正可以彌補與修正此項遺漏，具有理論探索的重要意義。

第二、本文也提出持第二種態度者的論點可能存在什麼樣的知識內涵？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與結構？它的論述邏輯基礎是怎樣的？又是否具有證成之可能性？本文主要的結果，在於從概念結構的分析中，獲得「統攝概念」在理論分歧現象中的角色與意義，以及由此可能獲致對理論爭議的解釋方法。此種結構化的基礎，乃爲基於概

註⑤ Robert O. Keohane, "Chapter 7," in Robert O. Keohane, ed., pp. 17~18, 159.

註⑥ 陳寒溪，「論華爾滋綱領的硬核與問題轉換」，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4 期（2007 年），頁 26~32。

念與概念之間的邏輯關係而存在。並於第四節的分析中，顯示了一組代表性的證據，說明此種概念的可驗證性。

經由本文的分析解答了前兩個問題之後，依然尚有幾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第一、本文指出概念結構以及「統攝概念」的觀點，究竟有無分析的意義？有無學者從事研究分析的經驗事實根據？關於這一點，可以從董納利就現實主義內部若干分歧觀點所做的冗長分析作為參照。董納利認為，在國際關係領域中，不應該存在任何一個可以涵蓋全部現象的邏輯，或者能夠解釋一個相當大的例如安全關係次領域的邏輯，以用為判斷不同典範的對錯問題。然而，董納利同時亦稱，他的分析對國際關係學科提出了一套多元的觀點。他認為，我們可以將國際關係研究視為一個更大的帳篷（bigger tent），擁有能夠包容其他不同研究綱領（research program）的空間，以用來理解不同時空條件下現實主義的特定內涵。^⑦此處董納利所說的一個可以涵蓋全部現象的邏輯，正是理論辯論的爭執所在，因此他才提出多元的觀點，並以一個可以容納分歧的大帳篷來形容。就某種程度而言，本文即為提出一種帳篷骨架的可能構想以做為理解理論分歧現象的基礎。

第二、既然「統攝概念」為解決理論爭論的關鍵概念，那麼如何選擇與形構此一「統攝概念」，則為後續研究的主要工作。首先，在前述的層次與面向為骨架的任一結構圖之中，任何一層次的任一概念，相對於其下一層次的諸項概念而言，均可以視之為一個「統攝概念」的意義。其次，依據研究的假設與命題之需要，選擇適當的邏輯與本體的若干關係，包括空間、時間、因果上的必要關係，以之構成一個概念間的縱向與橫向結構體系。例如，「利益」的概念，就是政府間執行任務的一個「統攝概念」。^⑧在社會學領域的研究中，Jeffrey Broadbent 就認為「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的角色就是分析日本政治行動的「統攝概念」。^⑨按此，「生存」或「安全」的概念，在不同條件之下均可能呈現不同的內涵，然而也都可以納入在一個統攝的「生存」或「安全」的概念之內。

第三、「統攝概念」，究竟應該置於甚麼層次的位置？就一個理想的一般性理論（general theory）而言，「統攝概念」應該位於較高的抽象層次，以便能含括較廣的解釋範圍。就一個中程理論或小理論而言，其相關的概念則位於較低的層次。例如，「自利」與「權力」等概念，即位於較高的概念層次，相對而言的博弈理論中的「期望值」等概念，則位於較低的層次。進一步言，如果欲在「衝突」與「合作」兩個對立關係的概念之上，形構一個「統攝概念」，則必須釐清其與「自利」與「權力」等概念之關係，以確定其在層次與面向上的適當位置。然而，統攝概念的確定，還是受到對需要整合的那些概念的界定與解決其間矛盾的無能（incapacity）所限制，並非一蹴可幾。^⑩

註⑦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96.

註⑧ John Warhurst, "Commentary Leicester Webb and the Foundation Years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Scie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7, No. 3 (2002), p. 554.

註⑨ David Strang, "Networking for Other Peop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6 (2004), pp. 150-151.

註⑩ Mario Prost and Paul Kingsley Clark, "Unity, Diversit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How Much Does the Multi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ally Matt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2 (2006), p. 352.

在寬廣複雜的國際關係理論範疇，理論建構並非可欲的目標，然而做為一個分析的目的，知識概念的結構化思考，可能有助於理解理論分歧的癥結所在。

* * *

(收件：96年10月1日，接受：97年2月29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Diversit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ming Lee

Ph.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Abstract

Over the last 20 years, theoretical debates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ly conspicuous part in the broader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f we are in need of an adequate theory that provides a set of plausible and testable answers to questions about theoretical diversity under specified conditions, the existing theory, in term, does not suffi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xisting diversity of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this end,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theoretical d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y the unifying concept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theoretical diversity.

None of these discussed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existing diversity, but only attempting to describe a theoretical debate that could be resolv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fying concept; great debates; theoretical diversity; concept structure; structuralized analysis

參考文獻

- 李哲賢，「荀子名學研究在美國」，<http://140.125.168.74/china/teachers/newleeweb/riting/%E8%8D%80%E5%AD%90%E5%90%8D%E5%AD%B8%E7%A0%94%E7%A9%B6%E5%9C%A8%E7%BE%8E%E5%9C%8B.doc>。
- 石之瑜等，「找魚：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倫理試論」，*政治科學論叢*（台北），第20期（2004年6月），頁79~102。
- 宋學文、楊昊，「整合理論研究之趨勢與應用：東南亞區域安全的分析」，*政治科學論叢*（台北），第28期（2006年6月），頁39~90。
- 余民寧，*有意義的學習概念構圖之研究*（台北：商鼎文化，1997年），頁70。
- 阮明淑、溫達茂，「ontology 應用於知識組織之初探」，*佛教圖書館館訊*（台北），第32期（2002年），頁6~17。
- 范捷平，「論 Stereotype 的意蘊及在跨文化交際中的功能」，*外語與外語教學*（杭州），第10期（2003年），頁27~30。
- 洪成完，「概念、範疇與遵循規則」，*東吳哲學學報*（台北），第5期（2000年），頁85~147。
- 秦亞青等譯，「譯者前言」，*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4。
- 桂起權，「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的經濟學應用」，*經濟學家*（北京），第6期（1999年），頁64~69。
-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大辯論研究的評析」，*問題與研究*（台北），第39卷12期（2000年12月），頁65~90。
- 莫大華，「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對話與綜合—美國『防止擴散安全提議』國際規範的個案分析」，*問題與研究*（台北），第45卷第5期（2006年9月），頁17~60。
- 陳宏銘，「現實主義典範的進步或退化：以 Vasquez 採 Lakatos 科學研究綱領的論戰為焦點」，*東吳政治學報*（台北），第17期（2003年），頁53~91。
- 陳寒溪，「論華爾滋綱領的硬核與問題轉換」，*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4期（2007年），頁26~32。
- 陳偉評，「刑法學兩個競合的邏輯學論證」，2007年6月21日，http://big5.hinalawinfo.com:8080/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8547。
- 黃旻華、郭銘傑，「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在國際關係學門的誤用：重新檢視現實主義典範進步或退化的辯論」，*東吳政治學報*（台北），第24期（2006年），頁117~161。
- 操鳳玲，「模糊語言的語用基礎—範疇的模糊性」，*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安徽安慶），第21卷第6期（2002年），頁97~99。
- Armstrong, J. Scott, "Assessing game theory, role playing, and unaided judg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No. 18 (2002), pp. 345-352.

- Ashman, Darcy, "Strengthening north-south partnership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 30, Iss. 1 (March 2001) , pp. 74~98.
- Baum, Matthew A. and Philip B. K. Pot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Forthcoming i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8 edition, http://www.polisci.ucla.edu/faculty/mbaum/ocuments/BaumPotter_AnnualRev.pdf.
- Bennett, D. Scott, "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 1816-1984,"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3 (July 1997) , pp. 846~878.
- Boulding, Kenneth Ewart and Lawrence Senesh, *The Optimum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Making Knowledge Serve Human Betterment*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83) .
- Bouwel, Jeroen Van, "Questioning structurism as a new standard for social scientific explanations," *Graduat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 No. 2 (2004) , pp. 204~226.
- Brooks, Stephen G.,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1, No. 3 (Summer 1997) , pp. 445~477.
- Chang, S. N. (張淑女) and M. H. Chiu (邱美虹) , "Using Lakatos's scientific programmes to analyze informal argumentation regarding socioscientific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April 4-7, 2005, Dallas/USA.
- Chang, S. 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cience and non-science major college students' informal argument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Lakatos's scientific programmes,"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Aug. 28-Sep.1, 2005, Barcelona/Spain.
- Cox, Robert W., "Chapter 8,"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 204.
- Creed, W. E. Douglas, Jeffrey A. Langstraat, and Maureen A. Scully, "A picture of the frame: Frame analysis as technique and as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Vol. 5, Iss. 1 (Jan. 2002) , pp. 34~55.
- Donnelly, Jack,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Eising, Rainer and Nicolas Jabko, "Moving targe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electricity liber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Iss. 7 (Sep. 2001) , pp. 742~767.
- Foster, Gregory D., "A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y," in James C. Gaston, ed., *Grand Strategy and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pp. 55~62.
- Goodman, Jay S., "The Concept of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ackground*,

- Vol. 8, No. 4 (Feb. 1965) , pp. 257~268.
- Gowin, D. Bob, *Educat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Hasenclever, Andreas, Peter Mayer, and Volker Rittberger, "Interests, Power, Knowledg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0, No. 2 (Oct. 1996) , pp. 177~228.
- Hermann, Margaret G., "One Field, Many Perspectives: 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 1998 ISA Presidential Add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4 (Dec. 1998) , pp. 605~624.
- Hoffmann, Stanley, ed., *Contemporary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0) .
- Jones, B. F., A. S. Palinscar, D. S. Ogle, and E. G. Carr, eds., *Strategic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gnitive instruction in the content areas*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987) .
- Kang, David C., "Hierarchy, Balancing, 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3 (2003/04) , pp. 165~180.
- Keohane, Robert O. ed., *Neo 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 Kraft, Herman Joseph S., "Human Rights, ASEAN and Constructivism: Revisiting the 'Asian Values' Discourse," *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Vol. 22, No. 45 (2001) , pp. 33~54.
- Kurki, Milja, "Causes of a divided discipline: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cau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Issue 2 (April 2006) , pp. 189~216.
- Lakatos, Imre,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pp. 91~180.
- Larzelere, Robert E. and John H. Skeen, "The Method of Multiple Hypotheses: A Neglected Research Strategy in Family Stud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5, No. 4 (1984) , pp. 474~492.
- Levy, Jack S., "Prospect theory, ration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Iss. 1 (March 1997) , pp. 87~112.
- Luttwak, Edward N., "On the meaning of Strategy," in *On the meaning of victory : essays on strategy*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86) , pp. 263~264.
- McClelland, Charles A., "A 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olit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and Design*, Vol. 2, No. 4 (March 1959) , pp. 32~34.
- McClelland, Charles A., "The Func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 No. 3 (Sep. 1960) , pp. 303~336.
- McClelland, Charles A., "Revi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General Theory," *The*

-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8, No. 3 (Aug. 1966) , pp. 700~702.
- Montgomery, Evan Braden, "Breaking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Reassurance, and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2 (2006) , pp. 151~185.
- Mowle, Thomas Stanley, "When do states adopt realist or liberal foreign policies toward ongoing wars?" An analysis using worldview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6, <http://handle.dtic.mil/100.2/ADA311580>.
- Munck, Gerardo Luis, "Gam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Perspectives and Old Concerns,"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2 (January 2001) , pp. 173~204.
- Novak, J. D., "Concept maps and Vee diagrams: Two metacognitive tools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Science*, No. 19 (1990) , pp. 29~52.
- Phillips, Warren R., "Where Have all the Theories Gone?" *World Politics*, Vol. 26, No. 2 (Jan. 1974) , pp. 155~188.
- Prost, Mario and Paul Kingsley Clark, "Unity, Diversit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How Much Does the Multi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ally Matt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 No. 2 (2006) , pp. 341~370.
- Rosch, Eleanor,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Allan Collins and Edward E. Smith, eds., *Readings in Cognitive Science, a Perspective from Psych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1988) , pp. 312~322.
- Ruggie, John Gerard, "Review: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Jan. 1983) , pp. 261~285.
- Rummel, R. J., "Field Theories In Summary," *The Dynamic Psychological Field*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75) , <http://www.mega.nu/ampp/rummel/dpf.chap6.htm>.
- Rummel, R. 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r, Power, Peace*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79) , Chap. 6.
- Seymour, Michael Dan Potts, Eleanor Robson, and Neil Asher Silberman, "Ancient Mesopotamia and Modern Iraq,"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5, Iss. 3 (June 2004) , pp. 351~368.
- Smith, Steve, "Dialogue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Orthodox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2003) , pp. 141~143.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idney Tarrow, ed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Vol. 1 (London: JAI Press, 1988) , pp. 197~217.
- Strang, David, "Networking for Other Peopl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6 (2004) , pp. 150~151.

- Tarquin, P. and S. Walker, *Creating success in the classroom* (Englewood, CO: Teacher Ideas Press, 1997) .
- Thayer, Bradley A., “Correspondence: Start the Evolution without U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Summer 2001) , pp. 194~198.
- Vasquez, John A.,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 pp. 899~912.
- Vasquez, John A. and Colin Elma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N. J. : Prentice Hall, 2002) .
- Wæver, Ol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 Walt, Stephen,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Walt, Stephen, “The Progressive Power of Re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 pp. 931~935.
- Waltz, Kenneth N.,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 pp. 913~918.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
- Wandersee, J. H., “Concept mapping and the cartography of cogni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Vol. 27, No. 10 (1990) , pp. 923~936.
- Warhurst, John, “Commentary Leicester Webb and the Foundation Years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Scie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7, No. 3 (2002) , pp. 547~563.
- Worrall, John and Gregory Currie, eds.,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pp. 47~89.
- Zurn, Michael and Jeffrey T. Checkel, “Getting Socialized to Build Bridges: Constructivism and Rationalism, Europe and the Nation-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Fall 2005) , pp. 1045~1079.